

贵州天主教文化史

GUIZHOUTIANZHUIJIAOWENHUASHI

● 吴道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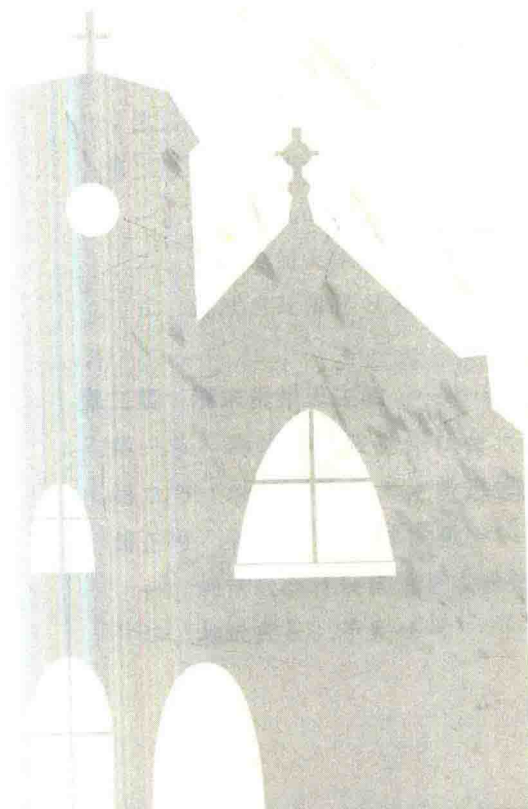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天主教文化史

GUIZHOUTIANZHUJIAOWENHUASHI

● 吴道军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天主教文化史 / 吴道军.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221 - 13625 - 1

I. ①贵… II. ①吴… III. ①罗马公教 - 基督教史 - 文化史 - 贵州省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3603 号

贵州天主教文化史

吴道军/著

出版人 / 苏桦

特约编辑 / 禄佳妮

责任编辑 / 周湖越

编辑助理 / 张黎

装帧设计 / 郑亚梅 禄仲春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刷 /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5

字数 / 34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 - 7 - 221 - 13625 - 1

定价 / 79.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天主教的创立和发展	(1)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2)
贵州天主教研究	(5)
贵州天主教传播特点	(11)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13)
第一章 天主教传入贵州	(15)
第一节 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活动	(15)
一、天主教传入时的社会背景	(15)
二、初传的途径和地域	(18)
三、南明永历朝廷与贵州天主教	(20)
第二节 清初至道光前期贵州天主教	(24)
一、贵州教区的设立	(24)
二、禁教期间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	(26)
三、清政府处治传习天主教者	(29)
第二章 清末贵州天主教	(32)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状况	(32)
第二节 教禁解除后天主教迅速传播	(34)
第三节 传教策略及其成果	(39)
一、利用教会特权促进天主教传播	(39)
二、接近民众, 予民以利	(44)

三、大力培养传教人员	(48)
四、建立传教机构	(50)
五、中外传教人员的贡献	(51)
六、贵阳圣母山“朝圣”提升教会凝聚力	(54)
七、传教成果	(55)
第四节 贵州天主教“教案”与中西政治和文化冲突	(57)
一、贵州教案起因	(57)
二、青岩、开州、遵义三教案	(59)
三、其他教案及冲突	(71)
四、贵州发生天主教教案的根源	(77)
第五节 文学艺术	(86)
一、文学	(86)
二、艺术	(95)
第三章 民国时期贵州天主教	(103)
第一节 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状况	(103)
一、政治方面	(103)
二、经济方面	(104)
三、宗教方面	(105)
第二节 天主教传播及影响	(106)
一、加强与官方交往，消减传教阻力	(106)
二、利用“传教特权”维护教会和教徒利益	(109)
三、扶贫济困，扩大教会影响	(110)
四、重视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培养、使用	(112)
五、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14)
六、融入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	(116)
第三节 天主教贵州教区的分设	(117)
一、贵阳教区	(118)
二、安龙教区	(120)
三、石阡监牧区	(124)
四、筹建黔北自治教区	(129)
第四节 社会组织	(129)
一、天主教文化协进会贵州分会	(129)
二、中国天主教妇女战时服务会贵阳分会	(130)

三、圣母军	(130)
四、天主教公教青年联谊会	(131)
第五节 教育事业	(131)
一、天主教宗教教育	(131)
二、普通教育	(139)
第六节 社会事业	(148)
一、医馆、诊所	(149)
二、孤儿院	(152)
三、报刊、气象站、植物园等	(155)
第七节 文学艺术	(157)
一、文学	(157)
二、艺术	(159)
第四章 当代贵州天主教	(164)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天主教状况	(164)
一、党和政府对天主教的引导和管理	(166)
二、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169)
三、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172)
第二节 “左”的思潮对天主教的影响	(175)
一、政治运动的影响	(175)
二、“捐献”活动使教堂减少	(177)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主教状况	(177)
一、查抄教堂	(178)
二、批判斗争神职人员	(179)
三、教会活动停止,教徒大量减少	(179)
第四节 新时期贵州天主教	(180)
一、天主教宗教活动恢复	(180)
二、教堂建设和管理	(182)
三、自选自圣主教	(188)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189)
五、恢复和建立天主教爱国团体	(191)
六、举办社会公益事业	(196)
七、开展宗教和文化交流	(199)

第五节 当代贵州天主教传播特点和问题	(201)
一、教堂管理	(201)
二、团体建设	(202)
三、神职人员	(202)
四、境外渗透	(203)
五、教徒结构变化	(203)
附 录	(205)
参考文献	(205)
清代至民国时期所建教堂分布表	(209)
大事记	(215)
后 记	(233)

导 言

天主教 (Catholicism), 亦称“公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 与东正教、基督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中文“天主”一词, 为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 借用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对所信之神的译称。

天主教的创立和发展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 世纪 30 年代的巴勒斯坦、小亚细亚 (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一带, 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流传于社会下层民众中一个派别。^① 当时, 罗马经过将近 300 年的战争, 建立起了地域庞大的罗马帝国, 实行残酷的奴隶主统治, 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受罗马帝国奴役和血腥统治的犹太人, 盼望着救世主的出现。这个新派别宣扬犹太人的民族神雅赫维 (又译为耶和華) 已经派了一位救世主弥赛亚^②来拯救世人, 这位救世主就是耶稣, 只要信奉上帝和跟从耶稣即可获救, 很快就有了大量信众。因希伯来文的“弥塞亚”在罗马帝国的希腊语中被译成基督, 这些追随基督的人自称基督徒。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 基督教徒一直遭受镇压和迫害。此间, 基督教不断修订教义, 扩展社会基础, 并注意向上层社会和皇室传教。罗马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对帝国的统治无害, 基督教逐渐得到

① 天主教、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这时两个教已经是基本上没有联系的两个独立宗教, 在称谓上已经十分明确, 即天主教 (罗马公教)、基督教 (也称新教、耶稣教), 这一点与国外介绍天主教历史有明显不同。在欧洲, 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天主教、基督教 [新教]、东正教) 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其历史演化十分复杂; 在中国, 天主教、基督教 (新教)、东正教因其传入前已经定型, 三教基本上无宗教意义上的交流, 历史脉络较为清晰。

② 弥赛亚, 一译“默西亚”。源于希伯来文, 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和祭司时, 受封者额上被敷膏油而称受膏者, 意指上帝所派遣者。犹太国亡后, 在犹太人中有传说, 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所盼望之“复国救主”的专称。基督教称所信奉的耶稣即弥赛亚 (希腊文作基督), 但不是“复国救主”, 而是“救世主”, 凡信他的人, 灵魂皆可得到拯救。

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发表“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4世纪末，罗马帝国又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基督教遍布欧洲、西亚和非洲。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罗马教会遂成为整个西派教会的领袖，西派教会逐渐形成教宗体制。基督教会相应地形成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西派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代表的东派教会。8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期间，矮子丕平将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得的土地赠给教宗（史称“丕平赠礼”或“丕平献土”）。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举行加冕礼，表示“君权神授”（由此构成延续至19世纪下半叶的教宗国）。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西派教会自称有“普世性”，是“至公”和“至一”的教会，即罗马公教（天主教）主要分布在西欧地区；东派教会自称有“正统性”，是“正统教会”，即东正教，主要分布在东欧地区。

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多明我会修士台彻尔到德国推销“赎罪券”，宣称教徒购买这种券后，可以帮助灵魂得救，引起德国教徒的极大反感，也在神学界引起思想混乱。时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的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题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辩论提纲（辩论提纲共95条，因此也叫《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教廷的统治范围内引起了连锁反应，欧洲各天主教国家内相继发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派生出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等新教派。这些新兴的教派最初被称为“抗罗宗”“抗议宗”“更正教”等，后被统称为“新教”或“基督教新教”。至此，基督教内部形成了罗马公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宗派。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天主教虽然在欧洲部分国家中丧失统治地位，但曾组织反宗教改革运动，成立新型修会（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米兰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等），派出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天主教主要分布于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

19世纪下半叶，天主教召开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提出“教皇首席地位”和“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以维持其神权，抵制教会内部的改革要求；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为天主教唯一真正的哲学，促成现代新托马斯主义的发展。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罗马教廷驻地正式命名为梵蒂冈城国。20世纪60年代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开始“改革”和开展“对话”等，关注普世教会运动，在神学理论上更新和多元化。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天主教于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是早期基督宗教中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传入中国后的称呼。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

中国长安（今西安）译经传教；3年后，建寺1所，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当时有教士21人，随后向全国各地发展。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等语。景教因受到了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6位帝王的礼遇，得以迅速发展。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皇帝下诏禁止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亦受到波及，2000余名教士被逐，教徒勒令改宗。景教从此在中国内地几近销声匿迹，仅残存于西北边地。

元代，留存在西北边陲的景教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国内地，在北京、杭州、西安、甘肃、宁夏、镇江和泉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教士也有被封官受禄者。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受罗马教廷派遣抵达汗八里（即今北京），受到元成宗接见，并获准在京建堂传教。大德十一年（1307年）春，因孟德高维诺传教成果明显，罗马教宗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并委任其为总主教。元代在中国传播的景教和天主教被统称为“十字教”或“也里可温教”，它们的信徒被称为“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之人”）。元明鼎革，也里可温在中国内地传播中断。

明代中叶后，天主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相继进入中国传教。其中，多明我会主要活动于台湾、福建等地；方济各会主要活动于北京等地，影响和势力最大的是耶稣会。最早被耶稣会派遣入华传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于1549年到日本传教，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企图进入中国传教，因为当时海禁森严，无法进入内地，只到了广东上川岛，因染疟疾于数月后去世。其后，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于万历八年（1580年）到广州，两年后到肇庆，住在佛教的天宁寺，开始传教，后获准建立耶稣会住院（名花仙寺），万历十三年（1585年）受两广总督郭应聘之邀来到浙江绍兴。此间，他用汉文撰写了介绍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天主圣教实录》，万历十六年（1588年）被召回罗马。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在肇庆、韶州、南昌等地活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与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结识，讲授天主教教义，传播西方天文、历算及数理等知识。利玛窦凭借天文、地理等方面学识供职于朝廷。他采取了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的传教方式进行传教，迅速打开局面。当时不仅部分王公达贵，就连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都皈依了天主教。继利玛窦之后，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传教士获准在中国13省传教。到明末时期，耶稣会在中国共建立了13处传教会所，信徒约10万人。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派信徒达数万人。

清初，传教士沿袭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得到清帝的尊重和信任，掌管钦天监。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朝廷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全国28个城市设有教堂，信徒约15万人。但就在康熙年间，天主教内部发生了是否准许中国信徒“敬孔祭祖”的争论，史称“中国礼仪之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认为应当从中国情况出发，允许信徒保留祭祖祀孔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利玛窦逝世之后，龙华民继任全国耶稣会会长，他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不同意见，随即引发了耶稣会内部在两个问题上的分歧：第一，关于天、上帝、天主等译名问题；第二，关于敬

孔祭祖等中国礼仪是否符合教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为获得中国皇帝的支持，在华耶稣会士把“敬孔祭祖是否含有宗教性质”这一问题上书康熙皇帝，认为：拜孔子是敬其为人师范，并非宗教崇拜；祭祀祖先是出于亲爱尽孝，也无求佑之意。这种观点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肯定和支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一月，教皇发表敬孔祭祖的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并派遣特使携带禁约来华公布。康熙帝认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并坚持在敬孔祭祖问题上必须遵守利玛窦成规。凡遵守中国法度的西方传教士可以领内务府准予传教的印票，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在中国合法居住；拒绝领票的传教士将被驱逐。于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大多数人服从教皇禁令，拒绝领印票离开中国。这样，在华传教士除少数在宫廷服务不从事传教者外，都因丧失合法居住权而离开中国。此后，罗马教廷又多次重申禁令，随着教廷与中国政府矛盾升级，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朝廷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教获准，除少数传教士供职于朝廷外，其他均被驱逐出中国。禁教政策自雍正起，经乾隆、嘉庆、道光朝廷续100多年，史称“百年禁教”。此间，清政府多次搜捕非法入内地传教的传教士。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除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外，还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此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7月3日），中法《黄埔条约》（10月24日），使美国、法国获得在中国传教特权；同时，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道光皇帝准许对天主教开放教禁，又于1846年正式颁布了对天主教的弛禁上谕，允许归还雍正、乾隆两朝查封的天主教教产。道光皇帝的上谕解除了对天主教百余年的禁令，但仍然把传教士的活动局限在5个通商口岸，规定“外国人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随后，咸丰八年（1858年）和十年（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都列有保护传教、赔还教产等条款，天主教因此得以在全国迅速发展。在此期间，由于某些传教士不择手段地扩充教会势力、庇护不法教徒、侵害中国民众、干预中国地方行政司法等行为，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洋教斗争，导致一系列“教案”。这一时期，天主教利用“教案”赔款，办学校、建医院、出版报刊、兴办慈善事业，借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取得了迅速发展，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信徒增加到103万余人。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战争接连不断，但天主教在不少地区仍保持发展势头。到1921年，全国天主教徒增至200余万人。中国天主教人士进一步觉醒，提出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罗马教廷为了讨好日本，竟不顾道义的谴责，于1934年公开表示承认日寇在东北炮制的伪满洲国，并把东北教会从中国天主教会中划出，成为伪满洲国教会，同时宣布原吉林教区法籍主教高德惠为梵蒂冈驻伪满洲国的“宗座代表”。1942年，罗马教廷不顾同盟国的劝导和反对，一意孤行地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罗马教廷的这些行为没有影响到中国广大爱国天主教徒坚持抗战的决心，他们不仅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青年教徒还参军走上抗日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从此

展开了全新的一页。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同年,中国天主教实行了自选自圣主教,彻底摆脱国外势力操纵。1980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成立,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贵州天主教研究

贵州天主教研究开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缓慢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各方面研究增多,有专著和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章。其研究内容分为4方面。

(一) 以历史学方法进行的研究

这类研究侧重于贵州天主教历史的考订和记述,理清天主教在贵州的历史脉络,对贵州天主教重大事件予以评述。

1. 历史研究

《贵州教史》,其系有关贵州天主教传播史料的汇编,由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罗勒收集编辑,原文为法文,共3卷;保存了大量贵州天主教历史资料。贵州天主教人士叶有实、雷维哲、张浚哲、陈道南和一些学者曾经进行翻译,部分内容刊载于期刊或文集。

《贵州省天主教教史资料选辑》(1—4辑),1959年下半年,贵州省和贵阳市天主教爱国会联合成立了贵州省天主教教史资料编写小组,由周健钟任主编,叶有实、雷维哲、曹志文、张浚哲等任编辑,教史编写小组对全省天主教教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和编辑。教史编写小组曾发动全省神职人员和教徒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提供了大量天主教史资料。1962年10月—1964年10月分4辑付印(内部发行),每册字数不一,4辑约40万字。书名第一册为《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贵州的侵略活动》,其余均为《贵州省天主教教史资料选辑》。

林建曾、王路平、王海涛、纳光舜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于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的初传、盛传和流变3篇中,各以一定篇幅阐述了天主教在贵州传播过程(原因、表现、策略、方式和特点等)以及天主教与贵州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冲突还有社会影响等。

柏怀思、林建曾、王路平、纳光舜、禄佳妮主编《贵州宗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天主教篇”(12万字),按天主教传入、清末、民国时期和当代,分4章记述了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天主教教会及社会组织,天主教社会事业,为序与贵州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以及当代传播特点等。

周健钟《法国传教士在安龙教区》(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介绍了天主教安龙教区概况、外国传教士传教活动、教区经济收入和管理、修院建设和办学成果、教区兴办慈善事业情况等。

韦廷忠、罗希《天主教安龙教区概况回忆》和《天主教安龙教区概况回忆（续）》（分别载《安龙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1年印、《安龙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1年印），以2.2万字的篇幅介绍安龙天主教概况、教区组织机构、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教区财产及经济状况、新中国成立前夕法国传教士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安龙天主教的新面貌等。

秦元明《安顺天主教会的传入和发展》（载《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版），详细记述了天主教传入安顺、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教会开办学校和医院、天主教与社会的关系。

雷维哲《天主教传入铜仁地区的情况》（载贵州省宗教志编写办公室编《贵州宗教史料选集》，1985年印），详尽考订和记述了天主教传入铜仁地区情况、历任传教士情况、推进传教的措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信徒情况、教会开办学校和医院情况等。

龚士凡、王维儒《三棒天主堂史略》（载《独山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9年10月印），详细介绍了独山三棒天主堂创建的历史、历任神职人员情况和教会主要活动等。

潘文质《天主教传入九阡概略》（载《存稿聚览》，2002年印），对清末天主教传入独山县九阡水族地区的原因、发展概况做了调查和介绍。

徐柏林《解放前白云区天主教情况》（载《白云文史稿》[第2辑]，1985年印），介绍了天主教传入白云区及其发展状况，教堂建设及活动等。

明秀丽《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传播》（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研究和阐述天主教传入时贵州社会经济状况、贵州早期天主教友的构成、天主教对贵州社会的影响等。

付全友《务川毛田天主教》（载《仡佬族百年实录》[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介绍了天主教传入务川毛田的情况以及天主教给当地教育、医疗事业带来的影响。

林建曾《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载《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1期），认为明末清初时，以天主教在南明永历王朝的活动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持续不断，对当时的社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影响，其间利玛窦、安类思、瞿纱微、徐光启、瞿式耜等表现尤为突出。其主流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刘志庆《贵州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5年第4期），通过对典籍的收集整理，对天主教在贵州传播概况和贵阳教区、安龙教区、石阡监牧区的机构设置、教堂分布、神职人员及信徒、社会事业（教育和医疗等）进行了系统介绍。

刘振宁《传统之力 载道之舟——黔西南布依山村天主教宣教对联功能解析》（载《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对搜集于黔西南布依族天主教徒聚居山村的数百幅宣教楹联语义功能进行了分析，对布依族天主教信徒运用楹联形式传布教义做了分类介绍。

2. 天主教文教事业研究

陈柏绿《贵阳天主教文教事业述略》（载《南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6年印），研究和介绍了天主教贵阳教区所办经言学校，大、中、小修院以及正道、崇正、世光3所小学和程万中学办学情况。

冯良才《桐梓县第一所私立小学——多默小学》(载《桐梓文史资料》[第1辑], 1987年印), 介绍了桐梓私立多默小学的前身是天主堂办的经言学校, 1932年春, 改办为私立多默小学。文章介绍了反映教师认真负责, 教学质量高, 学生成绩优良等情况的事迹。

秦元明《一所被人们遗忘了的小学——培英女校》(载《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984年印), 记述了安顺天主教堂所办培英女校的创办、发展以及由教会学校演变为社会办学的过程以及学校推行新的办学理念等情况。

王萼华《英锐良和程万中学》(载《贵阳文史资料选粹》[中],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介绍了英锐良教授1945年创办程万中学的经过以及该校所取得的成果。

贺培真, 李宗泽《贵阳市解放初期初等教育状况》(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7、28辑], 1989年印), 调查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接管的教会学校进行改造的情况。

徐文静、纳光舜《贵州天主教修院考述》(载《中国天主教》2015年第6期), 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天主教贵阳教区、安龙教区和石阡监牧区创办的3所小修院、3所修女院以及中修院和大修院, 做了全面调查, 详细介绍了各修院的创建、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以及成果。

纳光舜、习羽《民国时期贵州天主教兴办普通教育概述》(载《中国天主教》2016年第3期), 对民国时期贵州天主教兴办普通教育(小学及中学)情况做了全面调查, 并对其中有特色的几所小学及程万中学的教学管理、经费来源、师资、生源、课程设置、教学效果等做了全面介绍。

(二) 以社会学方法进行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 注重以田野调查、个案考察、文献和资料分析等方法获取资料, 在对资料汇集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对贵州天主教问题研究的结果。

1. 教案研究

周健钟《贵州三教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该书记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法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传教特权”, 进入贵州传教。由于天主教传教士藐视官府、欺压百姓、包揽词讼、庇护作奸犯科的教友等行为, 引起官吏们憎恶, 激起贵州各阶层人民的抵制和反对, 先后发生了青岩、开州、遵义3宗“教案”。本书对3宗“教案”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处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介绍, 为贵州第一本系统研究贵州天主教及教案的专著,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冯祖贻、范同寿等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为1989年11月20日—25日在贵阳市举行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对近代中国教案的起因、发展结果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曹继斌《茅口教案》(载《六盘水文史资料》[第4辑], 1991年印), 对天主教传入六枝茅口、传教士和教友的活动、茅口教案的历史背景、教案发生过程做了研究和介绍。

林建曾《浅谈贵州三教案中地主阶级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立场、态度的变化》(载《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 揭示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贵州青岩、开州、

遵义3宗教案发生、解决的过程中,朝廷和贵州地方官员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所需,对外国传教士的态度由反对转而妥协、退让,以至于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得寸进尺。

熊宗仁《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高潮的伟大开端:贵阳教案》(载《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分析了贵阳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和影响。对教案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进行了剖析。

李晓红《浅论遵义教案》(载《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对教案发生过程及影响做了分析,指出教案发生的原因主要有教会侵犯中国主权,干涉地方行政;吸收恶势力入教,危害地方安宁;包揽词讼,破坏中国司法权;敲诈勒索,霸夺田产,淫虐无忌。

林建曾《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清末贵州教案》(载《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认为天主教教案发生的原因除了文化冲突,另有一些政治、经济原因,但它们也多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凸显。

倪英才《有关田兴恕与贵州教案的两个问题》(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田兴恕发动贵州反洋教运动的背景和清廷处理田兴恕时的矛盾分歧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解析。

李梦骅《从贵阳教案看贵州人民的反帝斗争》(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贵阳教案不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和人民愚昧的问题,而是一场尖锐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天山《清代遵义反洋教运动琐况》(载《遵义文史资料》[第28辑],1996年印),对两次遵义教案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2. 天主教与社会关系研究

文永辉《神异资源——一个西部社区的宗教市场与宗教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考察了瓮安草塘天主教的传播、信教群体(神职人员、教徒)状况、发展教徒方式、天主教的本土化、教会组织等,并设专章(约5万字)进行了阐述。

陈天俊《西方传教士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渗透活动》(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西方国家传教士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传教活动、西方教会渗透的主要手段、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教会势力的扩张等进行了研究。

周健钟《于斌在贵阳的活动》(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45年11月,时任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总会理事长、南京总主教的于斌到贵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拜见时任省主席杨森、在省政府和省党部做报告和讲演、会见天主教人士等,文章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记述。

颂是《反帝爱国自办教会:回忆1950—1956年贵阳市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7、28辑],1989年印),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对贵阳市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过程及成果做了详细记叙。

张浚哲《贵阳市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概况》(载《南明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9年印),文章认为贵阳市天主教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初期是以反帝爱国为内容,在冲破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传教士的百般阻挠破坏中逐步深入地

开展起来的；其后反帝爱国运动广泛开展，贵阳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程昭星《传教士与贵州近代政治》（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贵州的工具，传教士的行为体现了殖民者的特征，传教士插手贵州社会政治，企图使贵州政治走向殖民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是传教士的靠山。

文永辉《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通过考察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乡村天主教友在日常生活和葬礼、敬祖等问题上处理与地方民俗关系等问题，认为农村天主教友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

孙景尧、龙超云《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蠡测：以安龙碑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考证和研究了安龙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关系的遗物和石碑——拉丁文石碑、法文石花瓶、刻有中西文永历皇帝及皇太后等人教名的莲花石础、凯尔特式十字架碑以及教会现存的产于法国的落地长柜钟、传教士油画等，认为这既是教堂标志和纪念物，也掺杂有张扬永历朝廷太后等信徒的“圣德”和传教“伟绩”的因素。

孙景尧、龙超云《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政权的遗物谈起》（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作者将中西史料以及南明永历王朝的天主教遗物结合分析，论述了明清耶稣会士上层传教适应政策及其活动的特点，认为从其与政权上层建立关系起步，到介入王朝军政要务，却落败于封建专制政统，均由于与政权上层“貌合神异”的原因，因而耶稣会士的基督教“道统”是无法适应中国封建专制政统和道统的。

（三）以方志学方法进行的研究

在地方志中多有关于宗教的记述，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突出了地域性、连续性、综合性和资料性。

贵州省地方志编制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专篇介绍了天主教的传入及活动，教区和社会组织，经典、教义及节日活动，教堂，宗教教育，社会事业，文学艺术，独立自办运动，天主教人物等。

贵阳市地方志编制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专设天主教篇，分述清代的天主教、青岩教案始末、民国时期的天主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天主教，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天主教在贵阳的发展概况，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参与社会活动等。

贵州省宗教学会编《贵州宗教概览》（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记述了贵州天主教传入和发展、教区及社会组织、教堂、修院及社会事业、天主教教职和天主教节日等。

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志·宗教志》（2004年印），记述了天主教传入，教堂、教产及教职人员，信徒，天主教经济来源和创办的实体等。

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较大篇幅对天主教传入、安龙教区建立、外国传教士在安龙的活动、“三自”革新和社会主义教育等做了记述。因安龙为天主教安龙教区所在地,该志较一般县志记述天主教更为详尽。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石阡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天主教传入、发展、分布做了记述。石阡为天主教石阡监牧区所在地,该志对天主教记述较为详细。

此外,天主教传播较早且信仰者较多的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修文县、盘县、桐梓县、绥阳县、习水县、湄潭县、遵义县、余庆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黄平县、惠水县、兴义市、贞丰县等县市区志书中也有天主教传播的记载。

贵州少数民族中,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水族等均有一些群众信仰天主教,因此,在贵州各地民族志中对当地各少数民族信仰天主教状况也有记述。如《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

(四) 从天主教建筑艺术角度进行的研究

这方面研究主要侧重于天主教建筑艺术的考察和研究,但又不是纯艺术的内容,其中也涉及政策和行政管理等问题。目前,这类文章不多。

洪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湄潭“天主堂”重新修建始末》(《贵州省湄潭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印),作者1980年负责湄潭天主堂的重建,亲历了在各级政府关心支持下,对已成为危房的湄潭天主堂进行修复的过程。

陶大熬《石阡天主教堂》(载《温泉之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和介绍了石阡天主教堂中西合璧建筑群的结构、式样、艺术特点。

张复合、郭杭富《贵阳北天主堂建筑考察及其历史研究》(载《建筑学报》2004年12期),作者考察贵阳北天主堂后认为,该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早期外来宗教建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实例,对其历史演变、建筑现状及特征、历史文化价值做了评述。

何磊《贵阳北天主教堂室内外环境设计》(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对贵阳北天主教堂的室内外环境设计进行了探讨。

周坚《黔风古镇古教堂——记贵州黄平旧州天主堂》(载《中国宗教》2015年第9期),对集欧式建筑风格和贵州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的黄平旧州天主教堂外形设计、内部结构、装饰特色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处理等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从总体上看,由于天主教问题的敏感性,国内学术界对贵州天主教历史的研究和天主教与贵州社会关系研究稍多一些,对贵州天主教现状的研究还比较少。即便是历史研究,对“教案”这类问题,受不同时期政策或政治需要的限制,研究和论述也不能深入,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因此,贵州天主教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第一,贵州天主教历史的综合研究十分薄弱,至今没有一本贵州天主教史的专著,系统研究天主教历史的文章也不多;第